

人口与计划生育
新论征文

论人口、体制和节制生育

· 原华荣 吴玉平 ·

人口问题的产生,节制生育的背景,计划生育与家庭计划的异同,市场经济在人口控制中的作用等,是我国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条件下,计划生育工作转轨必须涉及的重要问题。本文拟通过人口问题和计划生育源本的“体制说”的分析,对以上问题予以概略说明。

计划生育转轨的“体制说”

计划生育工作转轨的“体制说”,其主要观点和思路如下。

(一)人口问题是某种体制运行的结果,人口过剩是经济失败的另一种说法。

“体制说”把人口问题视为某种体制,具体讲是计划经济体制运行的结果。按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内的观点,短缺是计划经济的必然结果——一面表现为资源的不足,另一面表现为人口过剩。

“体制说”进而把人口过剩当作经济失败的另一种说法,即经济失败的标志。

(二)计划生育是计划经济的必然和有机构成,永远不可能解决人口问题。

“体制说”认为,计划生育直接源于计划经济,是计划经济的必然和不可缺少的有机构成部分。逻辑的推理是,计划经济要求社会生产按比例有计划发展——一方面是物质资料的生产,另一方面是物质资料与人口的生产。由政府出面进行的调节,之于物的生产,称作计划经济,之于人口生产,则叫计划生育。不论是计划经济还是计划生育,其主要

决策者或调控中心皆是政府。

“体制说”断言,由于人口过剩是计划经济体制运行的必然结果,所以,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作为其有机组成部分的计划生育,只能创造对计划生育的需要,却永远不能解决好人口问题,协调好人口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三)市场经济有利于生育率下降,家庭计划是计划生育工作的必然选择。

“体制说”认为,市场经济将对我国人口控制产生长远的积极的影响。

首先,市场经济将克服计划经济的弊病,通过市场价格体系,有效地配置和合理利用资源;通过国际贸易,有效地打破资源约束,从而克服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资源不足和人口过剩。同时,市场经济体制对经济发展的促进还将带来人口由传统经济部门向现代经济部门的流动,而这种流动将导致人们观念的变革,促使生育率下降。

其次,市场经济原则的确立将导致人们再生产行为的理性化,慎重对待并对其后果负责。

第三,市场经济将形成许多有利生育率下降的因素。如个人价值的强化、代际财富流向的改变、消费方式的多元化、时间价值的上升、家庭观念的淡漠等。只要有可靠的避孕手段,生育率的下降便是必然的。

“体制说”还认为,家庭计划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最佳的人口控制形式,是需要转轨的我国计划生育工作的必然选择。

综上所述,“体制说”的观点可概括为,永远不能解决人口问题的计划生育导源于短缺运行的计划经济,家庭计划是消除短缺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最佳人口控制形式。由家庭计划取代计划生育,是我国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一种必然。

“体制说”^①是符合逻辑的,但前提,从而结论却是片面的。对其观点的分析,将有助于回答本文开头所列举的,计划生育工作转轨必然要涉及的几个重要问题。

人口问题与人口调节

人口在其运动过程(自然变动、迁移变动、社会变动)中形成的与经济、社会、环境不相协调的结果称作人口问题。如贫困、失业、劳动力不足、住房、交通、教育、人口老化、过度城市化等。人口问题的产生,既有经济因素、社会原因和环境背景,又与人口自身运动的巨大惯性有关。可见,人口问题既是个经济问题、社会问题,同时又是个环境问题(如资源性贫困),而不单是个经济体制问题。把人口问题仅视为某种经济体制运行结果的看法无疑是片面的;计划经济有其人口问题,市场经济也有其人口问题。而且,同一经济体制下的不同国家,人口问题又各不相同。因为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中国和前苏联,前者表现为人口过剩,后者体现于劳动力不足。经济发达国家人口老化问题突出,亦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的许多发展中国家,则面临日益扩大的贫困。所以,人口问题既不单是某种经济体制运行的结果,也不是计划经济体制的专利。前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失败了。但人口过剩并不是它的主要人口问题。日本的经济是成功的,而人口的资源性过剩却始终与它为伴。把人口过剩视为经济失败的标志同样是片面的。

人口是一切社会行为的主体,人口生产是统一的社会生产中与物质资料生产相对立的重要一面。人口问题的产生是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体制说”的片面性即在于对人口、人口生产和人口问题缺乏全面的理解。

当人口的数量、质量、观念和结构与经济、社会、环境不相协调的时候,人们一方面调节物质资料的生产,一方面调节人口生产,以期达到二者的协调。对人口生产的调节,则称之为人口调节。见之于历史的人口调节有:鼓励增殖以扩大人口数量,节制生育以减轻人口压力,发展教育以提高人口质量,推行优生以减少残疾和遗传病患者等。

从理论上讲,人们可以通过对自身生产的调节使劳动人口与生产资料、全体人口与消费资料,人口与资源、环境达到平衡和适应,以调节人口再生产为目的的计划生育也可看作是计划经济体制的一种必然。而纵观历史,贫困、失业、劳动力不足或人口过剩,却始终与人类为伍。与人口生产相比,物质资料生产周期较短,波动性较大(尤以人类生存基础的食物生产为著),而人口生产周期则长且具有较高的稳定性。由此,便导致两种生产在实际上难以啮合——在劳动力缺乏时出生的人口,二十年后可能成为失业者;人口过剩时节制生育,几十年后仍面对庞大的人口群体——不论在何种社会形态、何种经济体制下,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人口与经济、环境的不协调。

如果我们把两种生产啮合——协调时的人口当作适度人口,那么,“协调人口与经济、环境关系”就如同法国人口学者索维眼中的适度人口一样,是个有用的概念,数学上的“虚数”。人类迄今为止的全部努力,不外是在人口少,劳动力缺乏时鼓励生育,在人口过剩时节制生育。

人口问题,不仅是社会、经济和环境演变,以及人口自身运动的历史结果,而且也是社会、经济、环境和人口自身发展的重要背景。由此,经济问题、社会问题和环境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个人口问题。当代全球性的

^① 参见“论经济体制与计划生育”,载《中国人口报》1993年8月9日。

节育运动,即是基于对人口重要性的认识,以控制人口数量,减轻人口对经济和环境的压力为宗旨所开展的。

鼓励生育还是节制生育,并不是经济体制的要求,而是人口情势的使然。我国实行计划生育,表面上是源于计划经济,实际是由国情所决定的,如同把保护环境也列为基本国策一样。虽然我们过去曾把计划生育与计划经济联系在一起,但那只是一种假象,一种对问题本质的误解——计划生育名称的使用,则加深了这种误解。

对计划生育本质的误解,使“体制说”断言计划生育永远解决不好人口问题。而事实是,我国的计划生育——实质上的节制生育成绩斐然,效果远超过实行家庭计划的所有发展中国家。“体制说”关于计划生育与计划经济,进而家庭计划与市场经济之间内在的、必然的联系,只能是脱离客观存在的虚构。

“体制说”的片面性,既源于对人口在社会发展中重大影响的轻估,更在于对经济体制作用的夸大。对历史和经济发达国家经验脱离背景的借鉴,则使“体制说”的片面性得到强化。

市场经济和节制生育

以经济为背景的欧洲人口革命,发生于19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30年代,历时半个世纪之久。经济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生产对劳动需求由数量向质量的转变,为出生率下降提供了经济背景。经济变化带来的社会进步和人们价值观、生育观的革新,则构成出生率下降的社会和思想背景。在欧洲出生率由高向低的转变过程中,以普雷斯为代表的新马尔萨斯主义所倡导的,尔后为“马尔萨斯主义者联盟”所推动的,以家庭计划为标志的节制生育运动,作出了历史性的重大贡献。

为便于同当代发展中国家比较,欧洲人口革命的经验及当时的经济、社会、节育背景,有七点需要予以明确。第一,欧洲人口革

命是以经济为背景展开的。“发展是最好的避孕药”是对欧洲人口革命经验的典型总结;第二,欧洲人口革命主要是一个自发的过程,一个为欧洲经济和人口情势允许的长过程;第三,贫困问题不突出,市场对劳动力,进而对人口再生产有明显作用;第四,节育运动在人口革命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只是以经济为背景的推波助澜,而不是根本性的;第五,以家庭计划为标志的节育运动,宗旨是宣传和服务,对家庭和夫妇没有约束力;第六,城市人口比重较高,人口文化程度较高,易于接受节育宣传;第七,殖民地对欧洲各宗主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及贫困问题的缓解,从而对人口革命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对当代发展中国家来说,情势则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一无可供掠夺和剥削,从而可迅速积累资本,促进经济起飞的殖民地;二因长期的殖民统治和被掠夺、被剥削所造成的经济落后和结构的不合理;三是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对经济发展的障碍——工、农产品间,原材料与制成品间价格的剪刀差和经济发达国家对能源、矿产资源市场在很大程度上垄断及过度消费;四为在单纯经济增长模式指导下对工业、城市的偏倚和由此造成的对农业、农村的忽视,经济的失调和贫困的扩大(全球11亿穷人,绝大多数生活在发展中国家)。

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导致出生率下降的经济、社会和思想背景并未出现或很微弱,而医学的引进却使死亡率显著地减低了,加之日益扩大的贫困对生育的强力刺激(大大掩盖了市场的抑制作用),便造成了二战后发展中国家的人口激增和出生率长期的居高不下。70年代开展的全球性节育运动,虽然取得了明显效果,但与人们的期望尚有较大差距。“人口浪潮”淹没了经济的成果。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迫切需要的是出生率的迅速下降——没有时间坐等人口革命的发生。由于过剩人口对经济的障碍,经济难以起飞

从而自发的人口转变无从出现。由此,节育便成为发展的首要前提。

对发展中国家而言,不仅要有从“发展是最好的避孕药”到“节育是发展的前提”这一认识上的转变,而且还由于贫困及贫困行为、低文化程度和高农村人口比重等对节育推行所构成的巨大障碍,而须以“有约束力”的家庭计划替代“无约束力”的家庭计划(1974年布加勒斯特世界人口会议上,多数与会国家都主张计划生育应是有约束力的)。在全球性的节制生育背景下,许多发展中国家人口出生率居高不下或下降缓慢,即与家庭计划的“无约束力”有较大关系。

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将对促进我国经济,进而解决人口问题产生深远的影响——竞争机制和价格杠杆的引入,将成功地消除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许多弊病,合理配置资源,消除资源的“假性不足”和人口的“体制性过剩”;通过市场的开放和国际贸易,缓解资源的短缺;有利于出生率下降的社会、经济、思想背景的生成等。

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只是提供了解决经济和人口问题的契机和部分可能。市场经济可解决资源的“假性不足”,但对“真性不足”却无能为力。作为一个人口为日本10倍的大国,国际贸易可缓解我国资源的短缺,但却难以打破资源对经济的约束。日本、亚洲“四小龙”等人口少的国家和地区的成功范例,对中国是不很适用的;市场经济可解决人口的“体制性过剩”,但却不能解决人口的“资源性过剩”。市场经济体制在解决经济、人口问题上的有限性,已为许多实行该体制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人口情势所证明。所以,不应幻想一实行市场经济,我国的经济和人口问题便会迎刃而解,如

同50年代的“社会制度决定论”那样。尽管市场经济体制在解决我国经济、人口问题上的作用是有限的,但无疑提供了有益的契机和部分可能。我们的任务是充分利用市场机制,使我国的经济和人口问题得到尽可能好的解决。

不论是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发生的人口革命(欧、美),还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进行的人口转变(前苏联),都是以经济为背景自发地展开的。当不具备人口革命自发实现的经济条件时,为消除发展的人口障碍,人为地推行节制生育,促使出生率的迅速下降,便是一种客观的必然。对任何体制的国家,都是如此。

同许多发展中国家一样,低文化程度、高比例的农村人口和贫困亦构成对我国节制生育的严重障碍。不论计划生育工作如何转轨,不论将来叫什么,计划生育、节制生育、家庭计划,都必须是有约束力的。约束力是至关重要的,在不具备人口革命自发实现的经济,从而社会、思想条件下,没有约束力,便不会有成功的节制生育。所以,“体制说”推崇的没有约束力的家庭计划,并不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最佳的人口控制组织形式,也不能成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计划生育工作的必然选择。但这并不意味着对家庭计划服务宗旨的排斥。

我国计划生育工作转轨是必须的,未来的组织形式有待于进一步探讨。但有一点却不容有任何动摇,即转轨后所确立的组织形式,既要以服务为宗旨,又必须是“有约束力”的。对人口的控制,既要有“看不见的手”,又要有“看得见的手”。

(作者工作单位:兰州大学西北人口研究所)